构建清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

编者按:思想史与学术史，是历史演进中最为深沉的内在脉络。构建清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，需深耕清代思想学术脉络，发掘历史发展的深层意蕴。本栏目收录两篇佳作：一则依托清初官修经学文献，剖析正统书写背后的夷夏观念；一则聚焦清代考据学，探究故训方言所承载的时空意涵，以文化视角拓宽研究视域，深化对清代历史的整体认知。

官修经学文献中的“夷夏大防”：以清初钦定《春秋》经解编刊为中心

任利荣

[摘要] 清以北方民族入主中原，在面对《春秋》经中“尊王”“夷夏大防”等关乎王权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时，清帝及其钦命的核心编纂团队通过编刊《日讲春秋解义》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，逐步确立并采取了删《三传》、删改《胡传》中涉及“尊王”“夷夏大防”相关论述的编纂策略，构建以“尊王”为核心、隐抑“攘夷”的《春秋》学阐释体系，以消解《春秋》经义中威胁政权合法性的论述，消弭因经解衍生出的文化对立，实现文化认同与大一统观念的构建。考证二书的编刊可以厘清删《三传》和删改《胡传》的缘起、具体过程与影响，揭示帝王经典释读的隐秘心态。

[关键词] 夷夏大防 《日讲春秋解义》 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 编刊

[**中图分类号**] K249 [**文献标识码**] A [**文章编号**] 1002 – 8587（2026）– 03 – 0054 – 012

尊王之典，莫过于《春秋》。清朝以北方民族入主中原，如何面对《春秋》经中“尊王”“夷夏大防”等关乎王权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，如何对它们进行阐释，这些就成为清初帝王必须解决的议题。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的编刊奠定了清初帝王对《三传》《胡传》的基本立场，这一立场直接影响到《日讲春秋解义》的改订。《日讲春秋解义》虽然成书于日讲活动，但最终的刊行是在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之后，经三代帝王合力而成。这两部书共同构建起清初官修《春秋》经解体系，删《三传》、删改《胡传》，尤其是删改涉及“夷夏大防”的文字，成为这两

[收稿日期] 2025–06–20
[作者简介] 任利荣（1985— ），女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、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，成都 610071，ronger5891@yeah.net
[基金项目]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清官修经学文献刊行与价值研究”（19XTQ007）阶段性成果。

部书的核心编纂策略，借此消解《春秋》经中不利于王权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与阐释。

目前学界对《日讲春秋解义》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的研究集中于思想内容分析和纂修相关的考证。思想内容分析重在考察清代《春秋》学中“华夷”观的发展流变，[①] 剖析《日讲春秋解义》的阐释特点，[②] 聚焦于康熙、乾隆二帝对“尊王”的不同解读，[③] 并对《胡传》在清代的遭遇有系统讨论，[④] 深入诠释清朝的“大一统”观。[⑤] 纂修相关的研究集中于考证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的纂修时间，厘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错误，[⑥] 梳理《日讲春秋解义》的悬置与清初文治政策的嬗变。[⑦] 然而从书籍史角度切入，聚焦《日讲春秋解义》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编刊完整书籍环流的研究尚付阙如，将这两部书合观，剖析清初钦定《春秋》经解阐释路径及特点的研究空间有待拓展。本文尝试厘清清初帝王采取删《三传》、删改《胡传》核心编纂策略的动因、过程及影响，借此挖掘清初帝王经学阐释路径在文化认同中发挥的作用，进一步剖析民族身份导致经典释读的隐秘角落。

一、《日讲春秋解义》：三代帝王的编纂与修订

《日讲春秋解义》是康熙帝日讲活动中儒臣进讲讲义的汇编。“日讲”顾名思义即逐日进讲，进讲的主要内容为经史典籍，经书以《五经》《四书》为核心，史籍以有助于政事的《通鉴》为重点。康熙帝是清代帝王中最为勤学慎思的一位，康熙十年（1671）四月初九日为首次举行日讲，遣大学士杜立德告祭先师孔子，自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经史日讲活动。其间康熙十二年三藩叛乱，停日讲。康熙十三年九月初一恢复日讲，此后寒暑不辍，直到康熙三十三年日讲渐少，《五经》《四书》《通鉴》都已经完成进讲，讲章多数付诸校勘梓行，日讲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
（一）《日讲春秋解义》书稿初成

康熙朝“日讲”诸经，年终汇编讲义进呈，一经讲完，立即以满汉文校订、刊刻。《日讲四书解义》《日讲书经解义》《日讲易经解义》都在日讲结束后刊行天下。《日讲春秋解义》《日讲礼记解义》最晚应当在康熙三十三年前完成进讲，但未立即刊布。

《日讲春秋解义》核心纂修者是高士奇，他是日讲时进讲《春秋》的日讲官。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，高士奇、张英奉命供奉内廷，专事进讲，其中《春秋》就由高士奇负责。康熙二十四年夏四月，高士奇奉敕撰写《春秋讲义》，[⑧] 康熙帝令其“以左氏为纲领”，“总裁《春秋讲义》”，[⑨]《春秋讲义》撰写完成后立即开始进讲。据《清实录》，康熙二十五年“《春秋》《礼记》，朕在内每日讲阅”，[⑩] 因此不晚于康熙二十五年，《春秋讲义》就已经撰写完成。这意味着《日讲春秋解义》书稿初成，但是根据日讲讲章年终汇进的定例，在进讲过程中康熙帝还会对《春秋讲义》进行修订，因此康熙朝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应当在《春秋》进讲完成之后正式成书。高士

① 萧敏如：《从“华夷”到“中西”：清代〈春秋〉学华夷观研究》，林庆彰主编：《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》4 编，第 18 册，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，2009 年。

② 邱婧：《〈日讲春秋解义〉阐释特点及其对三传的解读》，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20 年。

③ 秦行国：《论康熙、乾隆二帝对〈春秋〉中“尊王”的不同解读》，《清史论丛》2022 年第 1 期。

④ 秦行国：《胡安国〈春秋传〉在清代的遭际》，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22 年。

⑤ 杨念群：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：清朝“大一统”观再诠释》，《清华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20 年第 6 期。

⑥ 王丰先：《〈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〉纂修时间考正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9 年第 2 期。

⑦ 顾一凡：《〈日讲春秋解义〉的悬置与清初文治政策的嬗变》，《政治思想史》2023 年第 4 期。

⑧ 高士奇：《春秋地名考略》卷首《自序》，康熙二十七年刻本（李慈铭跋），国家图书馆藏，馆藏号：A01989，第 2a 页。

⑨ 高士奇：《春秋地名考略》卷首徐乾学《序》，第 3a 页。

⑩《清圣祖实录》卷 126，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己未。

奇作为《春秋讲义》总裁官与《春秋》日讲官，康熙二十六年就与徐乾学奉敕修纂《大清一统志》，[①] 据此可知，《日讲春秋解义》最后的成稿时间不晚于康熙二十六年。

（二）《日讲春秋解义》的重订

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并未在康熙朝刊行，乾隆帝的解释是康熙帝对《胡传》的态度前后有重大转变，“圣心自多未洽”。[②] 因此厘清康熙帝对《胡传》的态度变化，雍正帝、乾隆帝对《胡传》的认识，是剖析重订《日讲春秋解义》的关键。

《胡传》撰写于宋室南渡之后，面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、北宋亡国之痛，胡安国以“尊王”为基础，大力宣扬“攘夷”之说，他认为《春秋》是“百王之法度，万世之绳准”。然而王安石推行新法，组织编纂《三经新义》，以禁令废止《春秋》，因此科举不考，学校不读，经筵不讲，最终导致人欲日长，天理日消，“其效使夷狄乱华”。胡安国所撰《春秋传》以“尊君父、讨乱贼、辟邪说、正人心”为核心思想，以“用夏变夷”为根本大法。后人对《胡传》“攘夷”之说格外重视，尤其是面对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侵扰时，“夷夏大防”“攘夷”“复仇”就成为汉人时刻谨记并积极付诸实践的重要思想源泉。[③]

《胡传》在元代定鼎中原之后，被列为官学，悬为功令。明朝沿袭元代旧制，《胡传》定于一尊近四百年之久，其间朱子学逐步成为官学主流之一，尊胡崇朱是《春秋》学自南宋到明朝的主流发展趋势。元代立国六十年后将《胡传》定为官学，科举考试允许用《三传》及《胡传》，讲求外王之道。明朝为汉人天下，也不会对《胡传》中“夷夏大防”“攘夷”思想有所避讳。

康熙朝日讲活动中儒臣进讲《春秋》，延续元明旧例，以《胡传》为宗，康熙帝撰写的《御制日讲春秋解义序》表彰胡安国的功劳，认为《胡传》是他潜心二十年之作，“事本《左氏》，义取《公》《穀》，萃诸家之长，勒成一家之书”。即使《胡传》存在“持论过激，抉隐太严”的问题，但“要其本三纲，奉九法，明王道，正人心，于《春秋》大旨，十常得其六七，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”，所以《日讲春秋解义》仍旧以“胡氏为宗”，而“去其论之太甚者”，康熙帝直言“朕亦时有所折衷”。据此可知康熙帝在谕令儒臣编纂《日讲春秋解义》时，就开始了对《胡传》的删改。目前通过高士奇的相关史料无法得知到底删掉哪些内容，书稿又经过雍正帝的厘定，因此单从《日讲春秋解义》文本来看，无法确定康熙帝对《胡传》“去其论之太甚者”的真实情况。康熙帝推崇朱子，讲求内圣之道，面对“夷夏大防”时，较元代帝王更为谨慎，《胡传》的命运和地位就开始逐渐发生了变化。[④]

康熙帝晚年编刊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时，更加慎重地对待《胡传》中关于“夷夏大防”的论述，他对《春秋》“四传”的态度和编刊经解时采取的策略被子孙继承。但是由于这属于不可明言的隐秘心态，雍正帝一方面在面对“华夷之辨”时表现得毫不在意，一方面又在涉及“夷夏大防”时亲自下场论辩，如对陆生楠《通鉴论》的批驳。乾隆帝面对“夷夏大防”时，出于对自身民族性不断被汉文化消解的警惕，在《日讲春秋解义序》中对《胡传》大肆驳斥，他以尊崇程朱为立论，借朱子评价《胡传》“义理穿凿则非义理之真”“于圣人笔削之旨，未能吻合”来论断《胡传》的不足。[⑤] 乾隆帝又基于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对《胡传》的批判，认为康熙帝早在编纂《日讲春秋解义》时已经“圣心自多未洽”，明确说明经过雍正帝的重订，删除了《胡传》中涉及“夷夏大防”的内容，并盛赞修订后的《日讲春秋解义》“胡氏穿凿之说旷若发

① 高士奇：《春秋地名考略》卷首徐乾学《序》，第 3b 页。
② 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卷首《日讲春秋解义序》，乾隆二年内府刻本，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，馆藏号：990079209600203941，第 4b 页。
③ 胡安国：《春秋胡氏传》，钱伟强点校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0 年，卷首，第 2 页。
④ 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卷首《圣祖仁皇帝御制日讲春秋解义序》，第 3a–4b 页。
⑤ 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卷首《日讲春秋解义序》，第 2a 页。

蒙，笔削之旨阐明者亦过半焉”。[①]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不论是康熙帝还是乾隆帝，在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御制序中都仅提及明朝，并未述及元代。对于同样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，且将《胡传》作为科举考试科目的元代，清帝王极其默契地保持了一致立场。元代统治者并不认为《胡传》值得避忌，清帝王却屡屡批驳《胡传》中“夷夏大防”的内容，两相对比，可以看出清帝王对汉文化存在着或隐或显的警惕，一如他们一再要求满人保持国语骑射旧俗，一如他们编纂《清文鉴》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，一如乾隆帝在表彰国书优越性时对汉文化的批驳。即使康熙帝并没有彻底否定《胡传》，然而与元代统治者相较，他对待《胡传》的态度就显得极其暧昧，而这也就为雍正帝重订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埋下了伏笔。

基于对《胡传》认识的动态变化，康熙帝并未将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刊行天下，直到雍正帝即位，雍正七年（1729）才谕令对该书进行修订。有学者认为雍正帝此举与他刊行《大义觉迷录》直接相关，如果从“夷夏大防”的角度来看，曾静案只能说是原因之一，因为同年还有陆生楠《通鉴论》案。雍正帝亲自对陆生楠的观点进行批判，最后还下令将他在军前斩杀。《日讲春秋解义》的重订更多的是处于雍正帝继志述事、续刊官修经解的链条中。雍正帝稳定朝局后，从雍正五年到八年，相继将康熙帝御纂《四经》中的《钦定诗经传说汇纂》《钦定书经传说汇纂》刊行天下，《日讲春秋解义》正属于这一刊布官修经解链条中的一环。雍正帝修订《日讲春秋解义》的核心原则即基于康熙帝晚年对《胡传》的盖棺论定，直接依据是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的编纂体例。

根据乾隆帝《日讲春秋解义序》可知，书稿在雍正年间修订完成，并由武英殿校刊，于乾隆二年（1737）刊成。因此《日讲春秋解义》的重订，集中体现了康熙帝和雍正帝对《春秋》的认识，尤其是对《胡传》的态度。乾隆帝继承祖、父的立场，书刊成之后立即颁发给在京三品以上堂官、在外督抚学政。如乾隆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江宁巡抚杨永斌收到赐书后上奏谢恩，称：“经圣祖之聪明裁断，早已阐发无遗，博考旁稽，迨世宗而校订精详，尤觉折衷尽善。”[②] 乾隆二年十二月八日，广西巡抚杨超曾奏称该书经过修订变得“平易正直”。[③]

综上，康熙帝对《胡传》态度的转变是修订《日讲春秋解义》的根本原因，雍正帝继志述事完成重订。雍正帝对《胡传》的认识也与他的侍读卢轩相关，卢轩精通《春秋》学，对《胡传》持怀疑态度。康熙帝谕令卢轩为时为皇子的雍正帝讲解经史，疑《胡传》的思想必然会贯穿在他的经史讲读中。要之，康熙帝对《胡传》的态度是动态发展的，他的立场最终在编刊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时，通过删《三传》、删改《胡传》的编纂体例集中呈现。

二、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删《三传》、删改《胡传》

康熙帝晚年针对明代《五经大全》存在的不足，发起编纂御纂《四经》，包括《御纂周易折中》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《钦定诗经传说汇纂》《钦定书经传说汇纂》，并将它们定为官学，进一步全面构建清代官修经解体系。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在康熙六十年刊刻成书，这部书的编刊是在康熙帝主导下，众儒臣对历代《春秋》经传的系统梳理。虽然以“传说汇纂”为书名，但在“传说”去取之际暗含了删《三传》、删改《胡传》的核心编纂原则，删改的内容集中于涉及“夷夏大防”“攘夷”之类的论述，这一编纂原则的确立是康熙帝日讲以来对《三传》，尤其是对

① 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卷首《日讲春秋解义序》，第 5b 页。

② 《内阁大库档案》，江宁巡抚杨永斌，乾隆二年十一月十五日，台北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藏（本文所引《内阁大库档案》均藏于该处），登录号：055343。

③ 《内阁大库档案》，广西巡抚杨超曾，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八日，登录号：055714。

《胡传》认识与立场的集中体现。

（一）删《三传》：李绂对“义例”的阐释及执行

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与其他御纂《三经》不同，卷首没有凡例，因此无法直接获得它的编纂体例。然而在馆分修校对李绂的《穆堂初稿》中，收录了他与“同馆”讨论编纂“义例”的两篇文章：《与同馆论春秋义例书》《再与同馆论春秋义例书》。据此可知，纂修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时有凡例，只是成书后并未将它刊出。凡例核心原则中删《三传》的“义例”可以藉由李绂的文章管中窥豹，进而对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的编刊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。

《与同馆论春秋义例书》《再与同馆论春秋义例书》是李绂作为在馆分修校对审阅“隐公九年”“隐公十年”书稿后，面对诸位纂修官对“义例”理解不确，具体编纂混乱无章时对“义例”的解说，核心内容就是讨论、解释“删传”这一编纂体例，是两篇对“义例”的阐释书，也是重申必须严格遵照凡例进行编纂的告知书。

“隐公九年”书稿初成，交给李绂审校，他发现纂修官对纂修体例存在很多异议，还在书稿“侧注”：

> 论议以不全载《三传》原文为新例。
>
> 或极贬其非，至惊怪为何人高论？
>
> 又云：皮之不存，毛将安傅？不载原文，何用驳语？……谓案语不当数见。①

侧注内容是纂修官基于凡例而发，表达了三层含义：其一，不载《三传》原文就发表议论，这是前所未有的编纂体例；其二，对《三传》内容极力贬斥其非，令人惊怪诧异，这是谁的高明主张？其三，既然不载《三传》原文，那么如何对它进行批驳并下案语呢？

侧注之文，连用三个问句，两个是反问语气，否定和质疑，甚至不满的情绪溢于纸面。“隐公九年”“隐公十年”两篇书稿最早编成，纂修官们不遵守凡例，且大力质疑，李绂不得不对以上三个疑问或者说不满逐一进行解释，撰写了《与同馆论春秋义例书》。他认为诸位纂修官要么是“失记凡例，并《辨疑》《权衡》诸书俱未细览”，要么就是“徒欲立意见相攻伐，非有意于书局者也”，对纂修官们提出的异议予以彻底否定。②

首先，针对“侧注”的前两条，李绂用两条凡例来驳辨：第一，“今奉旨参用《三传》，说既参差，必折衷一是，使学者有所遵守。凡例所谓‘立义支离者不载’是也”；第二，“凡例所谓‘《三传》与经文、经义不合者，虽删去原文，仍载先儒驳正之说，使治经者有所考’是也”。康熙帝开馆纂修御纂《四经》的出发点就是要颠覆《五经大全》的地位，构建新的官修经解体系。对于《春秋》而言，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拟定了完全不同于《五经大全》的编纂体例。《五经大全》主《胡传》，辅以《三传》，《三传》全部载入，细行密字列于《胡传》之下。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则参用《三传》，还要对《三传》论议有参差者“折衷一是”，不再载入所谓“立义支离者”，目的就是对这些内容进行删削。且点明删削的是《三传》与经文、经义不合的原文，而“以合经之《传》列于前为正解，其不合者则散见于‘集说’中而加辨驳焉”。不合经的《三传》通常已经有先儒对它们进行辨驳，因此将这些辨驳的论说全部列于“集说”中，使治经者可以明白删削《三传》原文的原因，用这种方法来化解删削《三传》行为带来的困惑。简而言之，将合于经文、经义的《三传》及《胡传》列为正解，而凡是不符合经文、经义的《三传》皆删削，删削的原因集中体现在先儒“驳正之说”中，因此将“驳正之说”详细载于“集说”，以对不合之处进行辨驳。李绂认为“凡例之经营可谓尽善”。他对诸位纂修官侧注的回应与解释并未说明到底什么是“立义支离者”，什么是“不合经文、经义”，而这些才是不

① 李绂：《穆堂初稿》卷 41《与同馆论春秋义例书》，乾隆五年刻本，上海图书馆藏，馆藏号：T09812-35，第 3b-4b 页。

② 李绂：《穆堂初稿》卷 41《与同馆论春秋义例书》，第 3b 页。

载《三传》原文、删削《三传》的关键。最后他以“凡例，总裁所手进，内廷所覆阅，而圣旨所钦定，开局时人授一编，顾束而不观，久而遂忘，忽怪为何人之高论”结束讨论，用皇权威严反向指责提出异议的纂修官们不遵凡例。[①]

其次，对于“侧注”的第三条，不载《三传》原文，那么如何驳论《三传》并下案语呢？纂修官们认为既然已经删削了立义支离、与经文经义不合的内容，又何必要对删削内容进行驳论呢？删削就意味着否定，既然已经否定了，再对它进行驳论就失去了立论根据。因此在纂修书稿时，他们采取了模糊处理的方式，“既无定论，又不自加案语”，即不作论断，不作折衷，直接将《三传》解经不同的论述并存于“集说”，正是李绂所批驳的“往往《三传》异议泛然并存‘集说’”，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不符合凡例中“折衷一是”的要求。因此李绂再次以皇权威严来批判诸位纂修官的行为，“然既奉敕纂修，当定一说，不可以其难定，遂泛然并存，听斯人之自择也”，要求诸位纂修官必须严格遵循御定凡例，即使折衷《三传》为难事，也应当对其进行论定，不可以泛然并存，任人去择。李绂又从便于士子读经的角度论述，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的目标在于天下士人，尤其要服务于科举考试，是康熙帝基于对《五经大全》的不满，重新编订的《春秋》经解标准本，折衷异说是为了给初读士子提供指南，否则混乱不一，无法发挥它作为科举考试标准本的作用，更不能成为有别于《五经大全》的新经解。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加清晰地明白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所具有的帝王经解性质。《三传》《胡传》数百年来列为官学，悬为功令，备载原文已成定例，而且并没有对传文内容进行删削的编纂行为，如今却不仅不全载原文，还要对其进行删削，删削之后还要在“集说”中驳论删削的传文，同时还要对《三传》互相抵牾之处进行折衷，论定一说，李绂直言“此事于全书规模最为切要”。[②]

《再与同馆论春秋义例书》，是李绂审阅“隐公十年”书稿后，针对“诸公有疑采驳《传》之语，删《三传》原文，势必有有经而无传者”进行的阐释，也是继前文再次对凡例“《三传》中立义支离者不载”的进一步申说。诸位纂修官认为根据凡例要求，删去立义支离、与经文经义不合的内容，就会出现《春秋》经某些部分只有经文而无传文的现象。对此李绂不得已对“立义支离者”进行了解释，即“盖就《三传》互异之文，择其善者，去其支离者耳”，但“互异”“择其善”具体是什么，如何选择，没有继续阐发，但却更加明确了删传的态度和立场，他评价纂修官们的疑问“虑其无传遂不敢删《传》，是惩羹而吹齑也；欲删《传》遂至于无传，是因噎而废食也”。并明确批评诸位纂修官“似留意于书局矣，而实未之察也”。李绂用“隐三年春王二月”“隐八年，螟”举例说明，以上两条就是有经无传，但却对经义得失并无影响，“虽诸公亦不能使之有传”，因此根据凡例，他认为经文无传并非大问题，进而推论删《传》就更无须纠结疑虑了。[③]

综上，李绂两篇文章中所释读的“义例”，应当是编纂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凡例中最为核心的两条：

> 立义支离者不载；
>
> 《三传》与经文、经义不合者，虽删去原文，仍载先儒驳正之说，使治经者有所考。[④]

这两条内容正是康熙帝《御制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序》所言：

---

① 李绂：《穆堂初稿》卷 41《与同馆论春秋义例书》，第 4a–4b 页。

② 李绂：《穆堂初稿》卷 41《与同馆论春秋义例书》，第 4b–5a 页。

③ 李绂：《穆堂初稿》卷 41《再与同馆论春秋义例书》，第 5a–6a 页。按，当为“隐三年春王二月”。《穆堂初稿》“三”误作“二”。

④ 李绂：《穆堂初稿》卷 41《与同馆论春秋义例书》，第 4a 页。

是书以《四传》为主，其有舛于经者，删之。以“集说”为辅，其有畔于传者，勿录。[①]

李绂两篇与同馆君子论《春秋》“义例”的文章中并未涉及《胡传》，然而康熙帝明确说明《四传》中“舛于经者，删之”，因此《胡传》也在删削之列。删《传》以合经文、经义，成为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的核心编纂原则。

（二）世业《春秋》推尊朱子：“总裁”王掞

李绂坚决贯彻执行的“义例”即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的凡例，是“总裁所手进，内廷所覆阅，而圣旨所钦定”。[②] 因此删《三传》黜《胡传》是康熙帝与儒臣共同选择的核心编纂策略，用来消解《三传》《胡传》中的“夷夏大防”“攘夷”学说。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纂修时，对《胡传》的态度，首先取决于康熙帝的绝对主导，其次就是“总裁”王掞的全局统筹。

王掞被康熙帝任命为总裁官，与他的家学直接相关。太仓王氏自先祖王锡爵开始，《春秋》学就成为家族之学，王氏族人以《春秋》学应举，科名显赫于时。作为总裁官的王掞撰有《朱注发明》，这部书的内容思想与康熙帝推尊朱子高度一致，他在编纂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时必然全力贯彻康熙帝尊朱子的学术主张。除了王掞，根据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卷首职名可知王氏家族参与者众多，有其叔翰林院检讨王时宪、长子王奕清（因去世而不在职名中）、三子王奕鸿（时任湖广督理湖南粮储道按察使司佥事）、侄子原任翰林院检讨王遵扆、族孙提督陕西学政翰林院编修王誩。

王氏家族参与编刊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的盛况，在《翰林院检讨王秋涯先生家传》中也有详细描述。[③] 另有同乡翰林院编修王时鸿、中书科中书王祖慎、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王图炳。此外，翰林院编修杨绳武、户科给事中王澍都与王掞的侄子王遵扆是至交。他们保证了在纂修中秉持推崇朱子的学术立场，以及对王掞撰拟“义例”的坚定支持。清官修经学文献的编纂团队，核心成员全部由皇帝钦定，除了皇帝钦定的核心成员外，多数会由总裁来推荐合适人选，家族成员、同乡及友人、门生、幕宾就会成为重要举荐对象，这样的纂修团队就构成了一个学术主张高度一致的学术共同体。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以王氏家族为中心，兼及同乡、友人共计十位构成了核心编纂团队，保证了在编刊时始终坚决贯彻康熙帝的意志、践行总裁王掞撰拟的编纂义例。

（三）疑《胡传》：卢轩及其《春秋》学

纂修团队中尊朱子疑《胡传》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在馆分修校对卢轩。轩，初名辂，字素功，海宁人，“学有经术，通《春秋三传》，以诗游京师，倾动公卿间”。康熙三十五年举乡荐，卢轩因为非大兴籍士人而被弹劾，削籍归家。三年后康熙帝南巡，卢轩献《圣德诗》十章，得到了康熙帝的赏识，任命他为内官学教习，随后又令他为时为皇四子的胤禛侍读，“侍世宗读书新园，从容讲读，日见亲重”。康熙帝评价卢轩“此端士也”，令胤禛“善遇之”。康熙四十八年卢轩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武英殿总裁，后迁国子监司业，年五十六卒于任，康熙帝阅览他的遗奏惋惜不已，皇四子“哀悼出涕，赙奠至渥”。卢轩有一子，凤辉，字千能，“康熙甲午科举人，能世其家学”。[④]

卢轩沉潜于《春秋》学，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详述研习《春秋》的经历，九岁至二十岁学

---

① 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卷首《御制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序》，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，国家图书馆藏，馆藏号：A01983，第 3b 页。

② 李绂：《穆堂初稿》卷 41《与同馆论春秋义例书》，第 4a–4b 页。

③ 王遵扆：《秋涯诗稿》卷 4，沈起元撰《翰林院检讨王秋涯先生家传》，乾隆四十年刻本，国家图书馆藏，馆藏号：03023，第 5b 页。

④ 卢轩：《日堂文钞》卷末附《海宁州志 · 儒林传》，清刻本（该书无页码，拟以《日堂文钞目次》为第 1a 页，余则依次递推），国家图书馆藏，馆藏号：A03181，第 32b–33b 页。

习《春秋三传》，这十一年间都将《春秋》“用以资为墨义，于经学茫无见也”，[①] 康熙三十五年削籍归乡，他才从治经角度研读《春秋》，勤学苦思，直到去世。卢轩在《读春秋偶得题辞》中自述“轩好读《春秋三传》《国语》，有所得辄笔之。有关经者，有不关经者，无义例，无次第，积久成帙”，[②] 撰有《春秋》学著作共计五部：《胡氏传疑》《玩占广师揲蓍书》《三传纂凡表》《读春秋偶得》《春秋古经》，后来还计划撰写《三传择善》，可惜以上著述全部亡佚，现在仅存《日堂文钞》文稿一册。

《日堂文钞》中保留有《春秋三传纂凡表序》《上座主侍讲张公论撰三传纂凡表及择善书》《春秋古经序》《胡氏春秋传疑序》《读春秋偶得题辞》，可资考证卢轩疑《胡传》、不以《三传》为尊的《春秋》学思想。他认为“所疑者皆胡氏自说，其称引儒先旧义可疑者尚多，率不在是限也”；[③] “虽然《三传》之凡，皆有圣人之绪，未必皆得圣人之旨也”。[④] 以上观点与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凡例所谓《三传》有“立义支离者”，有“不合经文、经义”者一致。他在阐释《春秋》大义时，“不主胡氏所《传》，并参以《左氏》《公》《穀》之同异”，[⑤] 集中体现在《春秋三传纂凡表》，该书体例如下：

> 《左氏》居上，《穀梁》居中，《公羊》居下，率此义也。故《穀梁》又不可通，乃通之于《公羊》，《公羊》又不可通，阙之以存疑，不敢以他书补，虽在《注疏》亦所不用。[⑥]

又编刻《春秋古经》，尊朱子“从石经中录出”，“定为古经，刻之家塾，俾读《春秋》者知正本有在，而不致惑于近世三家杂糅之书，穷经之学乃可言也欤”。[⑦]

卢轩“以《春秋》绝学名动九重”，[⑧] 在他为皇四子侍讲六年后，[⑨] 康熙帝“嘉其究心绝学”，令他“承修《春秋传说汇纂》”。[⑩] 作为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的纂修官，卢轩疑《胡传》、不以《三传》为尊的《春秋》学主张就与李绂所阐释的凡例相合，至少可以判断他不是那位在书稿侧注的同馆君子，也不是随后屡屡提出疑问和异议的同馆君子。此外，疑《胡传》也是一种学术研究趋向，[⑪] 康熙帝编纂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时，他对《胡传》的态度及编纂原则与儒臣们《春秋》学研究合辙而行。

三、删《三传》、删改《胡传》举要

《日讲春秋解义》书稿初成，康熙帝因为对《胡传》心有未洽，在晚年编刊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时确立了删《三传》、删改《胡传》的核心编纂原则。面对《胡传》中种种“穿凿附

---

① 卢轩：《日堂文钞·上座主侍讲张公论撰三传纂凡表及择善书》，第 13a 页。
② 卢轩：《日堂文钞·读春秋偶得题辞》，第 28b 页。
③ 卢轩：《日堂文钞·胡氏春秋传疑序》，第 18a 页。
④ 卢轩：《日堂文钞·春秋三传纂凡表序》，第 19b 页。
⑤ 卢轩：《日堂文钞》卷首道光十四年管庭芬跋，第 2a 页。
⑥ 卢轩：《日堂文钞·上座主侍讲张公论撰三传纂凡表及择善书》，第 15b–16a 页。
⑦ 卢轩：《日堂文钞·春秋古经序》，第 17b 页。
⑧ 卢轩：《日堂文钞》卷首道光十四年管庭芬跋，第 2a 页。
⑨ 卢轩：《日堂文钞·上座主侍讲张公论撰三传纂凡表及择善书》，第 13b 页。
⑩ 卢轩：《日堂文钞》卷末附《海宁州志·儒林传》，第 33a 页。
⑪ 怀疑《胡传》的不止卢轩一人，参与编纂《御纂周易折中》陈万策的父亲陈迁鹤也疑《胡传》：“又颇疑胡氏《春秋传》深文臆断，未必尽得圣人之意”。陈万策：《近道斋集》卷 5《考庶子公行状》，乾隆八年刻本，国家图书馆藏，馆藏号：19378，第 3b 页。

会”之处，[1] 康熙帝采取了“去其论之太甚者”，[2]“舛于经者删之”“畔于传者勿录”的举措。[3] 然而议论太甚而被去掉的内容是什么？释读《春秋》经有舛讹而被删削的《四传》内容有哪些？因为违背经文、经义不被收录的条目是什么？这些只有康熙帝自已心有成数，雍正帝继承康熙帝的立场，对《日讲春秋讲义》进行了修订。而我们要想弄清《日讲春秋解义》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到底删改了哪些内容，只有对勘文本，这样才能更加清晰地展现清初帝王在面对《三传》与《胡传》时，他们的真实态度与删改程度。以下略举数例，以窥《日讲春秋解义》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对《三传》《胡传》的去取、改易。

大申尊王、正统之义，以黜《胡传》人心、禀命天子之论的“元年，春王正月”条：

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卷一：

> 胡氏安国推衍乾元、坤元之用，而谓：“体元者，人君之职，调元者，宰相之事。”又曰：“元，即仁也，仁，人心也。”虽理亦可通，而非经之本指也。《舜典》称元日，《商书》称元祀，古之帝王，义或有取，而遂目为圣人之书法，则凿矣。
>
> …………
>
> 胡氏安国乃谓孔子首绌隐公，以明大法，误矣……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，而以加王于正，为孔子特笔，亦臆说也。[4]

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卷一，仅录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，删除了《胡传》的释读，并在《集说》中以“案”语对《胡传》予以批驳：

> 案：《胡传》……盖《春秋》为尊王而作，故以王法正天下。《春秋》为万世而作，故以天道正王道也……《胡传》谓“仲尼首绌隐公，以明大法，故削之”，义恐未安。夫君行即位之礼，则书即位，不行，则不书，孔子安得而笔削之乎？[5]

《胡传》卷一：

> 元年。即位之一年必称元年者，明人君之用也……故体元者人主之职，而调元者宰相之事。元即仁也，仁人心也。《春秋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，故治国先正其心，以正朝廷与百官，而远近莫不一于正矣……
>
> 春王正月……以夏时冠月，垂法后世，以周正纪事，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，其旨微矣。加王于正者，《公羊》言“大一统”是也。国君逾年改元，必行告庙之礼，国史主记时政，必书即位之事。而隐公阙焉，是仲尼削之也。古者诸侯继世袭封，则内必有所承；爵位土田，受之天子，则上必有所禀。内不承国于先君，上不禀命于天子，诸大夫扳己以立而遂立焉，是与争乱造端，而篡弑所由起也。《春秋》首绌隐公，以明大法，父子君臣之伦正矣。[6]

“元年，春王正月”条关乎《春秋》两大核心要义：其一，“尊王”，何以“尊王”？《日讲春秋解义》认为《胡传》凿空臆说，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认为应该以天道正王道。《春秋》学说以“尊王”为大义，如何“尊王”就成为诸家论述的核心。康熙帝所认为的“尊王”，在于天道、王法。《胡传》所认为的“尊王”，则在于人心。清朝立国之初对汉人的屠戮，就与人心不合。更进一步，人心之论势必会走向民本思想，因此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帝王讨论“尊王”，就不能以人心为标准，这就是《胡传》被批判的核心原因。但是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并没有

① 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卷首《御制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序》，第 2b 页。
② 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卷首《圣祖仁皇帝御制日讲春秋解义序》，第 4b 页。
③ 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卷首《御制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序》，第 3b 页。
④ 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卷 1“隐公元年”，第 1b–5a 页。
⑤ 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卷 1“隐公元年”，第 8b–9a 页。
⑥ 胡安国：《春秋胡氏传》卷 1“隐公元年”，第 2–3 页。

直接辩驳，只是说“虽理亦可通”，后无奈将《胡传》的说法归于“非经之本指也”，① 但是如何悖经，没有继续论述。至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则换角度批判，大申“尊王”之义，“以王法正天下”“以天道正王道”，② 用“王法”“天道”论述王权的正统性，以此来淡化和否定《胡传》的人心之论。

其二，正统，何以正统？由绌隐公而引发的正统之论，《日讲春秋解义》认为《胡传》“误矣”，③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认为《胡传》“义恐未安”。④ 二者的论证都是从史事出发，认为隐公即位的事有，就会在《春秋》中书写，否则就不会，因此《春秋》没有书写即位的事情，并非贬绌隐公之义，隐公正统之位并无疑义。相较而言，《胡传》立论基于孔子所说的夏时冠周月，加王于正，目的在垂法万世，以立正统。《胡传》认为不是隐公没有即位这一史事，而是隐公得位不正，即位的史事被孔子删削。绌隐公的立论，意在言明诸侯的正统内必受之先君，上必禀命于天子，否则就不是正统，争乱造端，启篡弑之祸。《胡传》言：“《春秋》首绌隐公，以明大法，父子君臣之伦正矣。”⑤ 绌隐公为《春秋》开篇，用以明《春秋》义例，彰《春秋》笔法，以正父子、君臣之伦。仔细对比，《日讲春秋解义》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对《胡传》的辩驳单薄无力，试图淡化和混淆《春秋》义例。清朝立国，非内受之先君、上禀命于天子，因此倘若依据《胡传》的释读，王朝正统的合法性就岌岌可危。

“元年，春王正月”条，清帝王通过否定《胡传》，从而奠定了《日讲春秋解义》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的立论基础，尊王是绝对的尊王，与人心无关；正统，则是绝对的正统，如隐公一样，即使内不受于先君、上不禀于天子，正统性也不容置疑。

关乎清统治者民族身份的“夷夏大防”之论，如“隐公二年，春，公会戎于潜”条，《日讲春秋解义》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直接没有采录《胡传》。

《胡传》卷一：

> 戎狄举号，外之也……《春秋》天子之事，何独外戎狄乎？曰：中国之有戎狄，犹君子之有小人，内君子外小人为《泰》，内小人外君子为《否》……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萌猾夏之阶，其祸不可长也……正朔所不加也，奚会同之有？书“会戎”，讥之也。⑥

从《胡传》来看，这一条核心即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，中国与四夷，内与外，关乎王德、王道，点明此处的“春秋笔法”，不加正朔而书“会戎”，讥讽显而易见。而且此条的释读同样不录《公羊传》：

> 凡书会者，恶其虚内务，恃外好也……王者不治夷狄……东方曰夷，南方曰蛮，西方曰戎，北方曰狄。朝聘会盟，例皆时。⑦

《公羊传》亦涉及“夷夏大防”，因此同样不录，而所录《榖梁传》的释读文字并非解释“二年春，公会戎于潜”，而是对《春秋》经文的释读。因此，《日讲春秋解义》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不仅仅是不取《胡传》涉及“夷夏大防”的论述，实际上《三传》中凡是涉及“夷夏大防”的释读文字都不录。

又如“成公二年，冬，楚师、郑师侵卫。十有一月，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”条：

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卷三一：

---

① 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卷 1“隐公元年”，第 2a 页。

② 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卷 1“隐公元年”，第 9a 页。

③ 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卷 1“隐公元年”，第 4b 页。

④ 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卷 1“隐公元年”，第 9a 页。

⑤ 胡安国:《春秋胡氏传》卷 1“隐公元年”，第 3 页。

⑥ 胡安国:《春秋胡氏传》卷 1“隐公二年”，第 6 页。

⑦ 《公羊传》卷 2“隐公二年”，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（清嘉庆刊本）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 年，第 4781 页。

> 楚书公子，自婴齐始……《穀梁传》："楚无大夫，其曰公子，何也？婴齐亢也。"……以望国诸侯，降班毁列，与蛮荆之大夫会，辱莫大焉。[①]

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卷二二：

> 楚书公子，自婴齐始……《胡传》："……书其重者，则莫重乎降班失列，下与楚大夫会也。"[②]

《胡传》卷一九：

> 按……书其重者，则莫重乎其以中国诸侯，降班失列，下与夷狄之大夫会也。[③]

《日经春秋解义》敷陈史事，这是遵循日讲讲章的体例，但是其中仍旧将《胡传》"夷狄之大夫"改为"蛮荆之大夫"，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则改"夷狄"为"楚"，并且删掉了"中国诸侯"四字以及《胡传》后面大段释读文字。"中国诸侯"代表的是"夷夏""内外"之别，是随后删改"夷狄"为其他字样的直接原因。《胡传》大旨在于申论不可让君王与夷狄会盟，否则就是有辱君父的行为，是身为臣子绝对不可以做的。除了删改《胡传》外，这一条仅仅选录了《左传》，而并没有选录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，也是由于避忌导致的。

以上数例仅供管中窥豹，都是康熙帝圣心未洽之处。从《日讲春秋解义》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中《三传》《胡传》的引用来看，不仅仅会删削《胡传》，实际上凡是涉及"夷夏大防"的内容，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都在删削之列。若遇到无法删削的内容，就径直修改文字以讳华夷之辨。另外，对《胡传》的批驳，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掩藏对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的不满，只是碍于《三传》在诠解《春秋》时的重要历史地位，康熙帝无法太过直接地表明态度。《胡传》作为南宋、元、明官学，与《三传》并行，虽然地位较高，但是与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不可同日而语，因此通过批判《胡传》，继而删削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中"夷夏大防"的文字就可以同时进行。

四、余论

《日讲春秋解义》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删《三传》、删改《胡传》的真实原因在帝王叙事中沦为隐秘角度。《胡传》的确存在解经支离的论说，同时也有与经文、经义不合而过度阐释的地方，自《胡传》成书起就有人对这些论述予以驳论，然而从来没有删改《胡传》的行为，更不会出现不载《三传》原文、仅录驳论的编纂体例。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确立的删《三传》、删改《胡传》、不载《三传》全文的纂修体例，在开馆纂修之初就被纂修官们质疑为"新例""高论"，据此可以看出，当时参与编纂的诸多儒臣对这个凡例极为不满，甚至存在对抗的心态，否则无法解释"侧注"的行为。我们对读《三传》《胡传》《日讲春秋解义》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，删削、篡改内容一目了然，删削原因除了《四传》的确存在不合经文、经义的地方，更重要的原因是"夷夏大防""华夷之辨"。因此，所有涉及民族性论述的传文被删削殆尽，隐藏其后的是清帝王对自身政权合法性的诠解与大一统的构建。《胡传》在清初钦定《春秋》经解中仅仅成为一家之言，不再具有南宋、元、明以来与《三传》并立官学的神圣性。

综上，清初《春秋》经的帝王阐释体系采取了删《三传》、删改《胡传》的编纂策略，从文化传承、经学研究的角度而言，《日讲春秋解义》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着实不算两部出色的官修《春秋》经解。但从维护大一统的国家局面来看，删《三传》、删改《胡传》编纂策略的确立与实行，可以最大程度上消解威胁政权合法性的经学阐释，消弭因民族性衍生出的文化对立，

---

① 《日讲春秋解义》卷 31"成公二年"，第 21b−23a 页。

② 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卷 22"成公二年"，第 19b−20a 页。

③ 胡安国：《春秋胡氏传》卷 19"成公二年"，第 302 页。

以实现文化认同与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目的。

References

Qin Xingguo. “Hu Anguo *Chunqiuzhuan* zai Qingdai dezaoji ” (The Encounter of Hu Anguo’s *Chunqiuzhuan* in the Qing Dynasty). Ph.D. dissertation. Changsha: Hunan University, 2022.

Wang Fengxian. Qinding Chunqiu Zhuanshuo Huizuan zuanxiushijian kaozheng (Reassessing the Compilation Timeline of the Qinding Chunqiu Zhuanshuo Huizuan). *Zhongguo dianji yu wenhua* (Chinese Classics & Culture) 2 (2009).

Yang Nianqun. “ ‘Tianming’ ruhe zhuanyi: qingchao ‘dayitong’ guan zaiquanshi (How to transfer the Mandate of Heaven: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’s concept of the Great Unification). *Qinghua daxue xuebao (zhexue shehuikexue ban)* (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[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]) 6 (2020).

“The Distinction between Yi and Xia” in the Officially Compiled Confucian Classics: Focusing on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Imperially Endorsed Exegesis of *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*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

REN Lirong (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; ronger5891@yeah.net)

Abstract: As a minority dynasty ruling over China, the Qing Dynasty faced legitimacy challenges posed by concepts like “reverence for the sovereign” (*zunwang*) and “the distinction between Yi (barbarians) and Xia (civilization)” (*Yi-Xia dafang*), which were found in *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*. To address these ideological threats to their political legitimacy, the Qing emperors and their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compilation teams progressively established and implemented editorial strategies through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*Daily Lectures on the Meaning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* (*Rijiang Chunqiu Jieyi*) and *Imperially Authorized Compendium of Commentari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* (*Qinding Chunqiu Chuanshuo Huizuan*). The editing work dealt specifically with the concepts of “reverence for the sovereign” and “the distinction between Yi and Xia”, and it involved excising passages from *Three Commentaries* (*San Zhuan*) as well as selectively editing or deleting sections of *Hu Anguo’s Commentary* (*Hu Zhuan*). These alterations aimed to construct an interpretive framework of *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* which centered firmly on “reverence for the sovereign” while subtly suppressing the doctrine of “expelling the barbarians” (*rangyi*). The reinterpretation sought to neutralize elements within the classical meaning of *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* that threatened dynastic legitimacy, to eliminate cultural antagonisms arising from divergent classical exegesis, and thereby foster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“great unification” (*dayitong*) ideology. Examining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processes may clarify the origins, specific procedur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editing and excisions of *Three Commentaries* and *Hu Anguo’s Commentary*, as well as reveal the hidden mentality underlying the emperors’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s.

Keywords: *Yi-Xia dafang*, *Rijiang Chunqiu Jieyi*, *Qinding Chunqiu Zhuanshuo Huizuan*,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